

鸣 谢

对于我在罗汉姆普顿学院伦敦全球化研究组的同事们，我深表谢意。他们是 艾莱恩－德特莫尔斯、劳拉·巴夫尼、乔格·杜尔施米特、约翰·伊德、格雷厄姆·芬内尔、达伦·奥伯恩和尼尔·沃士布恩。他们的集体热情，他们那种随时乐于和我交换信息和观点的精神，都对我起到了奇迹般的激励作用。尽管无论从个人还是从集体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并不对本书负有什么责任。我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后来由约翰·伊德收集在《体验全球性的城市》一书中（1996）。他们中间，只有尼尔曾经直接介入过本书的成书过程。他先是对本书书稿给予深刻的斧正，尔后又不断地向我提供了绰绰有余而又翔实可靠的有关资料。他的鼓励和帮助非常宝贵。此外，与乔格的交谈也令我备加赞赏、获益匪浅。他对本书的贡献远不只在于智力方面。

还要感谢来自学院研究委员会、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以及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是它们慨许我一个学期的研究假期。沃里克（Warwick）大学的蒙特塞拉·盖博诺（Montserrat Guibernau）和热那亚（Genoa）大学的桑德鲁·西格尔（Sanbro Segre）曾分别就本书的初稿提出过洋洋大观、颇具洞察力和富有帮助性的指教，帮助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对初稿做出改进。对于他们，我极为感激，但唯

一感到抱歉的是没有时间对他们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都加以考虑。

比莱费尔德 Bielefeld 大学的理查德·格拉索夫 Richard Grathoff) 也令我心怀感激 这不仅因为他慨然同意从我手头接过编辑《国际社会学》的工作, 而且因为他给了我充满风趣而善解人意的友谊。

政体出版社 Polity Press 的托尼·吉登斯 Tony Giddens 在其介入时间的安排上恰如其分, 并给本人以正面鼓励。吉尔·莫特利 (Gill Motley) 曾很艺术地给我以信心 使我能安心等待出书。安·博恩 (Ann Bone) 向我指出 文字上的斟酌对于理论的严谨来说确实是一条有用的途径。朱莉亚·哈森特 Julia Harsant 令人愉快地迅速处置好了一切事情。安娜贝勒·蒙迪 Annabelle Mundy 也曾为笔者的所有思想而殚精竭虑。对于上述各位, 这里一并鸣谢。

苏珊·欧文 Susan Owen) 知道该书对于我们双方来说共同具有的丰富涵义, 这些涵义并不全都具有积极意义。本书的献词正是为感激她的支持而献给她的。不过 我们 5 岁的儿子托马斯·阿尔布罗 - 欧文 Thomas Albrow-Owen) 所采取的办法倒可能是最好的 他向我许诺要为圣诞节献上“另一本《全球时代》”。最后还要多谢斯蒂芬·阿尔布劳 Stephen Albrow) 他曾很有耐心地提供了令人增长见识的回答, 来回答较老一代的人很容易提出的有关格拉斯顿伯里之类的问题。

引 言

各种迹象的比较暗示出一种清晰可辨的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1995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研讨会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意识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扩散是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差异的。

1981 年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断言工业文明行将逝去 托夫勒已成为共和党人所钟爱的一种理论源泉。在英国 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研究项目也指出了一种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之深刻 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划时代的变迁 霍尔 [Hall] 和雅克 [Jaques] (1989)。

另一方面 尽管有种种关于‘新时代’的说法 (如‘自动化时代’、‘原子时代’、‘太空时代’、‘电子时代’、‘太阳能时代’) 但却仍然引人瞩目地顽强存在着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仍然处于‘现代’。这表明现代性思想在‘断言任何新奇事物——即便是新的时代——都属于现代性的事物’方面取得了何等的成功。因而，连后现代也决没有逃脱于现代之外。后现代也只能够依其与现代的关系来定义自身；并且，在有些人

看来，后现代只不过是现代的一个阶段——例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魏尔士 (Wolfgang Ivers) 1993 年所说的“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

现代性使其信徒们陷入一种双重困境 它承诺新的未来 同时又声称它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如我们从人际关系中得知的那样 双重困境是蓄意让人陷入无解的辩论 从而使人无法解脱。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在于拒绝采用原有的话语方式。我们只有继续向前 既超越现代性 又超越后现代性 并且认识到一种新的现实，才能够摆脱困境。我这里的言下之意是说 有的时候 理论性的辩论是被无视世事发展的对于现代性的怀旧情绪导入误区了。

本书使理论面对我们当前生活于其中的全球时代 (the Global Age) 的现实。书中的论点是新的 尽管卡尔·亚斯贝尔斯 (1955 年) 曾对之有所暗示——亚氏看到了 1945 年对原子弹的使用如何意味着全球的一体化。爱德华·特利阿克 (Edward Tiryakian) 甚至把“全球危机视作现代性统治权的空位期”(1984 年)。然而，尽管“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词语 希迈尔法布 (Himmelfarb) 那些把它当作一种重大社会转变来看的人们 尤其是 1986 年的贝克 [Beck]、1990 年的吉登斯 [Giddens] 和 1992 年的罗伯特森 [Robertson] 还是坚持强调现代性的连续性。

但是，人们却通过种种世界性的大事感受到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我看来 到我写本书时为止 这方面最令人瞩目的宣言来自“联合国全球变暖研讨会”该研讨会首次明确无误地宣告 全球的气候正在变暖。不可能再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瞩目的标志划时代变化的事情了。如果说广岛事件 即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用原子弹轰

炸日本广岛一事——译者注）标志着开始了向全球时代转变的阶段。那么，这一事件则无疑标志着这一转变阶段的完成。同时，它也意味着“现代时代（Modern Age）”已成往事。

在“这种对划时代的变化的体验”和“现代性的语言”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它使我们的公共话语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境地。用现代性的眼光来观察全球化的世界，其结果往往会倾向于以某种熟悉的框框来理解它，如把它理解为世界政府的实现、一种单一的世界市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性的文化、晚期现代性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理解没有一种能够对我们所经历的变化之流做出恰当的说明。我们已处于这样一种时刻，即必须承认我们的观念已静止太久、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了。

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解是局部性的说明，任何对“世界上发生的某种变化”所做的说明都属于局部说明。但这些说明中的每一种都具有太多的已成往事的现代的东西而太少了一些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的确，任何有关“现代性的终结”的谈论听起来都那么消极，以致使人联想到“历史的终结”，那么一幅骇人的前景。本书的意图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新事物显得明白易懂，同时，既不把它们同化为我们已经失去的那个世界，又不宣告什么“末日审判”。它既不提供安慰也不提供天启。

这样一来，本书就是对“现代性的思想世界”（the thought-world of modernity）的一种介入。介入的方式是从要求读者思考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时代（the Modern Age）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时代已以其占压倒优势的面貌和形态取代现代。随后，借助于身处新时代所具有

的位置优势，我们将能够对那个以往的时代予以评价。我们还将以并非为现代所专有的术语来描述新的时代。因为，现代性的叙事本身就具有其内在的缺陷。通过“保证其本身在任何时候都可免遭终结”这么一种做法，它只不过满足了人类对永垂不朽的渴望。本书则打算把现在当历史来处理，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故事中的部分——在这个故事中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时代都是平等的。我们可以用过去时态来描写划时代的变化。就现在而言，没有理由否认这种可能性。

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既对现代的全球化理论所使用的语言提出质疑，又对其就种种事实所做的解释提出质疑。被有些人称作“全球化争吵”（以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1962年提出“全球村”为肇始的事情实际上涉及到围绕“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是否真的意味着什么新事情”而展开的激烈争论。不过，其中许多争论都属于因词义分歧而导致相互误解，而这又是由陈旧的现代思维在说明新事物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不适宜性造成的——现代思维总是追求把新事物同化在现代性之中，把现在当作从过去脱胎而来的一种趋势予以更新。

正是出于对“公正地对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个时代”的关怀，使得我们必须把历史也考虑进来。并不是出于好古癖式的兴趣才提出把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审视。真正的“时间的考验”将会把现代时代认作历史的一个短暂阶段。同时，我们承认：人所具有的潜能远比任何一个历史片段所能够容纳的要大得多，无论该片段曾经多么富有活力、多么宽广辽阔。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不把全球时代同化为现代，或者换而言之，实际上也就是

不把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种文化同化于别的时代或文化；相反，我们把它们的成就分解开来以展现人的可能性的盛大阵容。人（humanity 就是主体 the subject）她既不一定非是‘现代的’人类（human being 不可 也不一定非是‘全球化的’人类不可。

本书前三章重新评价了与论述现代时代相关的问题。第一章讨论了为写现在的历史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必要条件。其中包括把它从现代性的种种自我叙述中解救出来。第二章揭示了种种现代性的叙述如何对于作为一个有关生存问题（包括物质性的生存和精神性的生存 民族国家声称拥有这方面问题的管辖权 的综合框架的‘现代规划’（the Modern Project）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第三章指出‘现代规划’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它寿终正寝的时候 并因而指出寻求一种新的历史性叙述的必要性。

为说明与全球化有关的语言对于我们实现一种对我们的时代的新的自我理解所能够做出的贡献，第四章对有关全球化的语言加以筛选。第五章审视了有关我们的时代的种种说法，发现这些说法因试图把全球性（globality）同化于已成往事的现代时代（the Modern Age）而曲解了各种划时代的变化。

第六章和第七章接受了把我们的时代当作一个超越了现代性的历史新纪元来看待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它们对各种现象的新架构（这些现象以往仅仅被看作现代性的表征或其即将发生的解体的表征）做了探索，以展示这些现象自身特有的非现代的条件。

第八章考察了全球化议题对政治而言的种种后果，认为这要求我们恢复社会的概念化和以往被现代性抑制的国家。该章确认为一种新型的受民众欢迎的国家结构 我将其称为‘表演型的公民

身份”(performative citizenship)。由此使得政治家们需要重视民族国家的相对化和他们对国民提出的要求，而在以往的现代时代中 他们认为这些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第九章通过提出如下观点而结束全书：全球时代的叙事所包含的不只是要求改变我们用以思考我们的时代的思维方式。把它作为用以说明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的一种解释性前提，也同样必要。

新思想需要新研究。有一点必须从现在就加以明确 即 围绕着现代性、工业化、民主化、官僚化、城市化和理性化而展开的汗牛充栋的研究 其各自本身都给人一种感觉 使人感到有一个持续不断且无所不包的现代化过程。然而 这些“过程”却从来都没有一个达到了确定的终点，倒是都变成了现在看来属于一个已逝的历史时期的特征的东西。如果说“过程”应当是受一定的科学法则支配、有一定结果的发展的话 那么 可以说上述“过程”从来都不是什么过程 全球化也不是什么过程。“现代化”一词中的“化”(-ization)这个后缀本身就标示出 那种企图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同化于现代的事物(the modern)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由那种做法导致了种种对当代所发生的变革极度轻视的解释。对于说明时代更替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 1975 年曾合情合理地把这种更替描绘成“从扩张到公道合理地生存的变迁”来说 那种做法不可能是恰当的做法。

有的人把全球化想象为自由贸易的扩大。但是，即使在经济学家们中间也众所公认的是：自由贸易的扩大只不过是 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即交换在生产 and 消费中具有中心地位的世界经

济——中发生的变革的一个方面。值此已置身于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之中的时候 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经济方面的事情 就显得是一种狭隘的唯经济主义的观点了。对于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变革来说，那些只把全球化想象成关于贸易壁垒问题的人们显然是严重地准备不足的。

从根本上来讲，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 (globality) 来取代现代性 (modernity)；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 通讯系统的全球性 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 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

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 就对那种认为‘现代性会不断扩张’的观点，并因而也对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此外，这种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还会鼓励其公民及其其他机构跨越原有的物质和精神藩篱。其总的后果，就是一种对民族国家来说比十九世纪工人运动以来的任何事情都更广泛而深刻的威胁。现代性的解释一再误读了这一点。民族国家的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国家和民族的分解，力图既执行一种全球性的合理性又精简政府 但与此同时却失去了与其公众的联系。

我们可以同意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的观点 种种后现代的条件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分析性的模式来框套民族国家了。那么 这‘种种条件’都是哪些呢 由于本书随

后将会详细述及的原因 使得对于把握划时代的时代更替来说 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对这些条件予以大体概括便不合时宜。用“全球性”(globality)这个提法会更稳妥些 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什么非如此不可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全球性所具有的与生活之间的复杂 并且往往是矛盾的 联系又要求我们必须把这种变化作为划时代的变化来说明。就我所知,没有什么提法会比“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这个提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了。

本书利用了许多学科的知识,但其主要的问题背景出自社会学、社会政治理论、历史学以及较新一些的文化研究领域。希望能遇到对这四个知识领域都感兴趣的读者,并希望在他们的书架上能为新的时代理论(epochal theory)辟出一席之地。时代理论的广泛意义并不在于为各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毋宁说,它的广泛意义在于指出由人类实际生存条件中形成的问题;至于问题的答案 则因历史阶段和文化之异而各异。这些问题包括 达 成理解 沟通 人际关系 生与死 正确与错误 奖与罚 权力、自由 与和谐;人与自然。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衣、食、住那样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基础意义。但是,诸如“社会”、“国家”、“共同体”、“幸福”、“正义”之类观念之一再被人反复提起,意味着它们并不仅仅是现代的纽结(modern fixes),因为它们从来都没有获得过一种终结性的意义。它们所意味的,是为达成带根本性的再评价所必需的标志划时代变化的标尺。

我能够作为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这种观点找到的最好的称呼就是“务实的普世主义”(pragmatic universalism)。它既不拘泥于科

学的确定性 也不执迷于宗教的确定性 而是以人类日常切身生活经验及其比较文化学和历史学资料为依据。用晚期现代式的 (late modern) 尺度来衡量 假设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为“0”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为“10” 那么 我大概在“6”左右。寻求处于这两个极端者——一个是极端的科学相对主义, 一个则是为探索生活的意义而生活——之间的道路 是每一个力求抓住当前生活的人所面对的命运。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早就为这类理智的中庸之道提供了范式。虽然他的著作是有关现代性的最不朽的遗产之一 但‘全球时代’还是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它。

因此, 我并不因为宣布以下观点而对韦伯或我的同时代人感到抱歉 前现代的、非西方的思想家们的贡献 会在有关全球化问题的争论上给我们提供启发。用学术的语言来说, 这要求我们从时代理论方面来反思以往对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理解。在更广泛的人类层面上来说, 这也就是要求人们把所有的人都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智慧源泉予以尊重。全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 全人类无论男女老少都已在维护各自向人类知识宝库做贡献的平等权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用日常通俗语言来讲, 以上所述就是意味着“忘记现代性”。在您不再考虑某事是否‘现代的’的时候 看看它对您的言行意味着什么。当被告知某种样子‘是现代的’的时候 问一问您被说服去接受的是什么。在适当的地方 用诸如‘新的’、‘同时代的’、‘当前的’、‘合理性的’之类的概念来取代‘现代的’。以一定的这样那样的别的理由来判断一种产品之新 (newsness) 而不是简单地喜

欢它的新奇 (novelty) 逐渐习惯于思考 陈旧的现代式的 事情。如果您愿意的话，把式样古老的属于现代派的纪念品的东西收集起来，但要记住您并不是在简单地追逐现代性。摆脱令人窒息的现代对于想像力的抑制。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全球时代为我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天地。

有很多时候 在存在观点分歧的情况下 局外人对于形成自己的思想往往会起极大的作用，而照本宣科则会引人误入歧途。我怀疑这样一本无先例可援引的书（我明白并非所有的内容都史无前例 其中有些内容形成于我对很久以前的东西的追忆 是否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不过 在全球时代 对于新奇玩艺儿是没有什么奖赏的。就算我声称书中的观点都具有创新性，以前从未被人提出过 您也还是应当依据其他标准来判断它们的价值。

1 重续纪元史

对于宣告现代时代的开始来说，最有决定性的事件是 1492 年美洲的发现。与此相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 1945 年将原子弹投放到日本，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时代之即将终结。两个事件之间发生的现代性的故事，是一个旨在扩大人类对空间、时间、自然和社会的控制的方案的故事。该方案的主要代理人，是依靠并通过拥有资本的、军事的组织来起作用的民族国家。它赋予人民生活和世代更替以鲜明的式样。然而，当它在全世界统一之际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就是它寿终正寝的时候。随着世纪的终结，虽然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的标志已然树立，却四处弥漫着后现代的迷茫。问题恰恰首先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它意味着什么。冷战、三个世界、人类在 1969 年登上月球、电子化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 又译“地球村、世界村”——译注)美国因苏联在 1991 年解体而欣喜，以及最终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切都并非意味着凯歌高奏的现代性，而是意味着崭新的全球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成了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

无名氏 公元 2050 年

1.1 拒绝现代

为什么除了被迫在永恒的现代性和历史的终结之间进行选择之外还有另外的选择。

前面本章开头的那段话可能会使一些人对其感到古怪，甚至感到自相矛盾。它那匿名的作者此刻也许虽然还正在求学，然而却以一个相当常见的有点老式的编年史家的方式在写作。它读起来像一篇现代的叙事，然而却宣告现代时代的终结。这难道不是在自挖墙角吗？它留给我们的是因以下情形而令人困惑的感觉：我们时代的历史，却被按照为过去的年代写史的方式写出来。

但是 我却要为它辩解 这个叙事很有意义。由它引起的困难并非源于它的自相矛盾，而是源于在当代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解释之中存在的广泛而现实的混乱。本来应该完全可能写一写现代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如果事实上真的是现代时代已经终结而新时代已然开始的话。但是，我们却甚至连冷静地想一想作这种说明的可能性都未能做到。现代性已经牢牢地控制了知识分子们的想像力，甚至在它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之后仍然如此。

我们的困难缘起于对现代时代的说明一直力图按照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来为其寻找某种基础。因而 随着现代时代的消逝，人们便以为基础崩溃了 并因而以为随着这些基础的崩溃 也就丧失了使我们的时代有意义的任何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现代性的

辩护者们和后现代性的辩护者们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如果不建立一些原则，世界就没有意义可言。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对“这些原则是否存在”的回答上。

但是，观念和原则对于时代、文化和文明来说并不比神学对于宗教、社会学对于社会来说具有更多的基础性意义。与此形成对照，我们的虚构的叙事者则把历史纪元当作暗潜于各种过程和最一般意义层次上的关键事件之下、决定人类奋斗、决定各种非人格力量的命运的唯一星宿。她或他参考到我们时代的结构轮廓，但不是把它当作理论或原则，而是当作种种真实的制约。其所谈论的是关于权力集团、关于核战争、关于对人身的威胁等等。与备受人们关注的当代有关包罗万象的历史的演义相比，这种叙事是“宏大叙事”。¹

本书缘起于对一个历史新纪元的探讨。它只限于对以往一些议题的再讨论，因为正是从过去，我们才能辨别出对现在的曲解之来龙去脉。所以，虽然我们直接关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转型，但还是必须回答一些比这早得多的话题，即现代时代的话题。我们不再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抗拒的运动，因为它并未在事实上证明如此。因此，我们将既致力于确定全球时代，又力图达成对作为一个短暂的历史纪元的现代时代（它具有其独特的面貌，已然让位于另一个历史纪元）的认识。

新时代并非后现代时代，尽管它在时间上处于现代时代之后。照韦尔施·沃尔夫冈（1993: 6）的观点，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之最近的极端的形式。照约翰·格雷（1995: 8）的说法，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自我破坏（the self-undermining of modernity）。无论照哪一种

说法 后现代性都是现代性的表述 无论它是多么自毁性的。现代的东西仍然保持着它对知识分子想像力的控制。

我们必须听一听更广泛的交谈中所使用的属于新时代的语言。其使用最多的是“全球的”一语 其各种变化的表述有如“全球化”、“全球主义”、“全球性”等等。这些术语是用来标示新视角、新风格、新战略、新力量、新利益和新价值观的标签 这些新价值观并不一定认为新奇事物必定就好，它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取代现代性的方针。它们标志着被历史学家们认作划时代变革的那种全方位的转型。

我们还未曾真正学会写眼前的历史。这种失败 起源于现代性用以苟延残喘的那种方式足以妨碍我们认识到当前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最严重的情况讲 它意味着 即使是那些承认全球化是一场深刻的当代转型的人们 也竭力把全球化同化成现代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即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

乌尔里希·贝克以说明“后”这个前缀已成为当前的一个关键词为开头。他虽然发现这一事实昭示着一种历史性的断裂，但却依然把它定位在现代性之内。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了一种新的、超越于工业社会之外的灵活的现代化 在这种现代化中 风险的生产变得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即使在风险把全球笼罩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 贝克正是在这里引入了“全球化”这个概念的)看起来现代性仍然能够继续其反省性的道路。

上述贝克的这种看法，忽视了在全球性的参照系 (the global

reference 的照耀下凸现出来的反省的界限。任何方面的反省 最终都会以不反省为结局 即以遇到障碍或以标志着结束分析、开始行动的决策为结局。把全球视作一个整体，就正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点——在这一点上，对于具有扩张性的现代性来说有一个突然的停止，一种真实的转型发生了。

现代性竟是这样扭曲了知识分子们的想像力，以至在他们看来，对现代性的终结的展望甚至会促成诸如历史的终结之类的观点 福山[Fukuyama], 1992)，或者至少也会使得无法把历史作为人类的故事再写下去（莱奥塔 Lyotard], 1979 瓦提莫 Vattimo], 1988）。然而 这些著名的悖论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现代性断言自己垄断了一切新奇事物。假若一切新事物本质上都是现代的事物，它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终结当作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予以把握。现代性远不是赋予历史以其全部庄严，而是使过去的事情除了作为现代性本身的序曲之外便毫无意义，并且使得它自己除了把未来想象为它自身的继续或想象为一团混乱之外便不可能想象未来。

诸多有关现代时代之终结的宣告，理应鼓励我们把有关历史时期划分的问题重新提到显著地位上来。然而 问题是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开端 关于某个时期的‘终结’的宣告听起来就会像是宣告我们所喜爱的一切事情都终结了。² 因为即使在它们对新事物的探求中，与过去之间的一致感也是那种把现代的人们粘合到一起的感觉。二十世纪初 对于界定现代时代来说，《剑桥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是一本受到广泛承认的权威之作。从该书的引言中 我们可以读到上述感觉的正宗版本 即正宗的对现代性的理解：